

明清时期 杭嘉湖市镇史 研究

陈学文著

群言出版社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陈 学 文 著

1. 本书目录	(1)
2. 绪论	(4)
3. 绪论	(1)
4. 明清时期嘉兴城市经济史	(48)
5. 明清时期湖州城市经济史	(150)
6. 明清时期嘉兴和湖州三个府属(乌镇、濮院、海盐、嘉善)的市镇史研究	(117)
7.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134)
8. 明清时期湖州府属的社会经济结构	(139)
9. 明清时期湖州府属的社会经济结构	(169)
10. 明清时期嘉兴府属的社会经济结构	(185)
11. 明清时期嘉兴府属的社会经济结构	(189)
12. 明清时期下湖、微湖二市镇的经济社会结构	(211)
13. 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241)
14. 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石门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245)
15. 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255)

群 言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178号

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陈学文著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余杭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74千字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

ISBN7—80080—102—0/K·8 定价：8.00元

序

陈学文教授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一书即将出版，这是值得庆贺的。我感到由衷地高兴，看到了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代史学工作者已茁壮成长并取得学术成就。

早在五十年代大学求学时陈学文就积极参加红楼梦时代背景的讨论，初露头角，受到有关专家的重视。尔后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孜孜不倦于明清史、中国经济史等领域的探索，发表了这方面百余篇学术论文，先后出版了《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台湾稻禾出版社，1991年）等学术专著。

陈学文在五十年代中期即开始了城市史（含市镇史）的研究，1958年发表了《明清时代佛山经济的初步研究》，后来集中于江南城市、市镇史的研究。他的江南市镇史研究有如下特色：一是重视研究的基础工作。不急于求成，有“沉潜”的涵养，脚踏实地，从蒐集、整理史料着手，从大量的文献、碑刻、史迹、口碑等资料中爬梳，先后整理汇编了《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等资料集。二是重视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的结合。对一些文献记载他力求到实地调查，这是一般学者难以做到。如对石门镇榨油业的研究，是从实地调查中发现旧油坊，然后得出明人贺灿然《石门镇彰宪亭碑记》（万历）记载的油坊规模等重要史料的可靠性。三是师人之长，大量阅读国内外有关论著，取人治学方法。他重视计量定性的研究，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因为研究市镇很自然牵涉到地理学、城建学、商品经济学等学科，

他虚心向内行人请教。刻苦钻研,所提出的见解就比较有深度和创见。四是思路缜密,方法科学。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坚持求真务实学风,思维缜密,学风严谨,每一立论都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不作缺少根据的演绎或推导。这正是我们学界所提倡的学风。

中国城市化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以城市带动乡村,推动社会前进。城市化的研究实是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因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马克思全集》23卷390页)城市化代表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列宁全集》19卷264页)“城市本身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马克思全集》3卷57页)城市化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城市化的道路是具有自己的特色。进入明清时代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大中城市已呈定型,而大量的市镇兴起,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城市化研究的关键乃是封建经济结构和商品经济。这二个问题的研究需具有高层次的理论功底和坚实的基础。必须把市镇纳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这一大领域中去研究,才可把市镇、商品经济、市场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来研讨,否则孤立研究某一个方面都不可能深入它的底蕴。

陈学文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选择了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作为重点是很有意义的。他逐一细致深入比较研究,有选择地对一个个市镇综合研究,这种个案研究也是可取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道路和取向深得同行的赞誉。陈学文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在这一园地里辛勤耕耘,发表了令人注目的有价值的论文,今将汇集出版,无疑地必将会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我深信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必将会取得更丰硕的成绩。

彭泽益 1993年6月26日

彭泽益，191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中国经济史学家，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著有《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太平天国革命思潮》等。

序

大凡在中年以后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往往是在青年时期即认定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经过二、三十年的艰巨跋涉才能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历史学是一门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才智固然重要，而勤奋则是不可或缺的。无后者，只能成为瞬间即逝的彗星，而勤奋则可以构造一座坚固的大厦。本书作者陈学文先生就是在史学园地里耕耘了数十年的勤奋者。

学文兄和我是五十年代前期的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前后同学。那时的山东大学无论大环境、小气候都十分有利于学术研究。山大校址位于风景优美青岛的鱼山，背山面海，景色宜人，是读书的好地方。校长华岗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系又拥有一批朝气蓬勃、年富力强的教授队伍。童书业先生的春秋史、古代东方史，陈同燮先生的希腊罗马史，韩连祺先生的秦汉史，王仲莘先生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张维华先生的秦汉史、明清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土地制度史，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年谱学和史部目录学，黄云眉先生的明史考证，杨向奎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和赵俪生先生的农民战争史等，都堪称一绝。《文史哲》办得十分火红，刊登的史学论文往往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历史系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在这样的气氛熏陶下，同学们也都十分重视自己研究能力的锻炼和培养。当时规定二、三年要写学年论文，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虽然大家还很不成熟，但对这件事的认真程度，似不亚于今天的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学文兄的毕业论文《中国十六、七世纪农业中商品生产和雇佣关系的初步研究》，就有十二万字，

作为大学毕业论文应该说是很出色的，因此得到校方的赞誉，并印发送请吴晗、邓拓、傅衣凌、李文治等著名史学家评阅。

1957年他大学毕业时，正逢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一场厄运，他的研究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天津、温州等地工作与所学专业不一致，研究条件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专业的热爱，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利用节、假日，自费到上海等地图书馆收集资料。即使在“文革”期间，身处逆境，仍未放弃对专业的执着追求，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厦门大学等都曾希望调他去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调到浙江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得以一酬其志，从容地埋头于学术研究。

治史贵为求真，而求真得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是他在大学时期的信念。他奉献给史学界的第一本书《嘉兴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就是这种观念的实践。该书分为甲、乙两编，甲编为文献资料，几乎囊括了所有正史、类书、方志、文集、笔记的有关资料，凡例中说：“历代志书常有辗转抄袭的现象，本书编纂时尽量追溯最早的出处”。乙编辑录了碑刻46件，都是反映当地经济文化、风俗民情的资料，尤足珍贵。这本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如日本《东洋学报》发表了著名史学家山根幸夫教授的专文评介。以后又编辑出版了《湖州府城镇经济史料类纂》，除了与上书同样体例外，还增加城镇沿革、人口、参考论著等附录，为他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学文兄为这两本书写的前言，实际上就是明清时期嘉兴、湖州二府城镇研究的总结，资料翔实，论证精当，堪称史学佳作。学文兄的治史生涯，就是建立在这样扎实的基础之上，其功力之深，令海内外史学界为之叹服。

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为中外史学界大家感兴趣的课题，成果频出，浸浸乎成为一专门之学。在当前我国健在的

史学家中，学文兄对市镇的研究是比较早的。1958年他就在广东《理论与实践》刊物上发表了《明清时期佛山经济研究》，可以说是他对明清市镇研究的开始。三十多年来发表城市、市镇史论文60余篇。与此同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1991年台湾出版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他这两本专著集中反映了他数十年致力于明清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上商品经济的专题研究的丰硕成果，体大精深，自成体系，在海内外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学文兄的治学道路，可以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学经历。道路漫漫，阻碍重重，付出的多，获得的少。然而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过来的。他在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是三十多年一贯致志的结果，这对现在年青一代史学工作者来说，似乎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学文兄的又一部新作《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即将问世，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也为老同学的成就而高兴。在大作出版之际，承学文兄谬爱囑为之序，对此我深感难胜此任。因为对江南市镇史专题，我完全是外行，恐怕说不到点子上。然而再思之，新作精辟高论，自有方家慧眼评说，无须我赘言，鉴于同窗之谊，略陈对作者治学严谨，勤奋的钦佩之意，也未尝不可。故草此篇，除了表示祝贺之外，还希望他更上一层楼，为我国史学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邹逸麟 于复旦大学

1993年7月初

邹逸麟，1935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第三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辞海·历史地理》主要撰稿人之一，《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著有《千古黄河》等。

目 录

1. 彭泽益序	(1)
2. 邹逸麟序	(4)
3. 绪论	(1)
4. 明清时期嘉兴府市镇经济的发展	(48)
5. 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	(100)
6. 明清时期杭州府仁和县三个市镇(塘栖、临平、笕桥)的历史考察	(117)
7. 明清时期江南巨镇乌青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132)
8. 明清时期双林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149)
9. 明清时期南浔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169)
10. 明清时期王店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185)
11. 明清时期新市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199)
12. 明清时期乍浦、澉浦二市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214)
13. 明清时期江南的一个专业市镇——濮院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231)
14. 明清时期江南榨油业市镇——石门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245)
15. 明清时期江南丝织手工业重镇菱湖的社会经济结构	(253)

16. 明清时期硖石、长安二市镇的社会经济结构	
——兼论明清时期江南米市发展的意义·····	(266)
17. 明清时期杭嘉湖各专业市镇概述·····	(282)
冶铸业生产中心——炉头镇·····	(282)
竹器业生产中心——陈庄·····	(284)
玩具制造业生产中心——孩儿桥、曹王庙、半山镇···	(285)
漆器、铜器制造业名镇——斜塘(西塘)、打铜汇	
·····	(285)
建筑器材业的市镇——瓶窑镇、千窑镇·····	(287)
毛笔制造业中心——善琚镇·····	(288)
丝织业古老市镇——晟舍、练市·····	(290)
丝织为主兼具多功能的市镇——新塍镇·····	(291)
棉织业的专业市镇——魏塘镇、枫泾镇·····	(293)
杭州城内的几个专业市——湖墅市、寿安坊市、北	
关夜市、香市·····	(295)
湖州西部山区的各市镇——四安、施渚(埭溪)、三	
桥埠、箬头、鸿桥、递铺、上柏·····	(300)
织里的造船业和书船·····	(301)
18. 绍定《澈水志》在市镇历史文献上的地位·····	(310)
19. 附录:	
宋元明清杭嘉湖市镇沿革表·····	(320)
1988年杭嘉湖市镇疆域、人口统计表·····	(324)
国内外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市镇论著目录·····	(331)
20. 后记·····	(340)

绪 论

一

中国市镇史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热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对市镇的发展需要作出科学的论证，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镇企业大量发展起来，农业人口逐渐向副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转移。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尤其是乡镇企业较发达的地区，人口向交通便利的新居民点集结，形成了许多新市镇。一些原有的市镇也得到更新和扩建，涌现了大批市镇群体。在江南、华南乃至华中、华北等地市镇犹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大地上破土而出，形成了一个茂繁的市镇网络。市镇经济与大中城市经济相互结合，互相推进，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各地对市镇的重建、扩建、新建都很注意，城建部门作了若干规划，合理布局，科学建设，俾使市镇经济纳入城市经济体制之中。为了城镇的建设和城市体制的改革，必须对市镇的历史和现状都需进行调查研究，于是现实的发展，促使了人们对市镇史研究的重视。从学术角度来看，国内外学者早已瞩目于此，把它作为城市史的系统进行深入研究，藉以探讨历史科学中的一些规律。

江南的一些市镇处于风景线上，环境优美，园林建筑雅致，大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情趣，古代一些文人学士寓居于此，

以文会友，咏诗绘画，一些退出仕途的文人，远离尘嚣，又要生活方便，就择小镇营室构房过着悠闲恬静的田园生活。如明代大文人茅坤就择居湖州练市镇上，构筑“白华楼”数十间以作藏书楼。吕坤择居杭城北的塘栖镇建“樾馆”，与江南才子文征明辈相唱和。现在要开发旅游资源，一些具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市镇，竞向国内外开放，吸引了众多旅游者来游览，若茅盾的故乡乌镇，徐志摩的故乡硖石等，每天就有不少国内外旅游者来游览观赏。为了追溯市镇的去与预测未来的发展，也就需对市镇史进行研究。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研究市镇史也颇具吸引力，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年就以调查江苏吴江江村出名，尔后这几年他继续深入研究，发表了题为“小城镇、大问题”的社会学论著。从历史学的出发，对研究中国政制与经济体制的演变，也需对市镇发展过程进行综合研究。从历史学与经济学交错的经济史研究出发，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农村副业的加工业和城乡手工业的发展，市场、市场网络、市场经济等都需对市镇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近十多年来，各地都在修纂地方志，市镇志自然列入方志之丛，现在相继已有塘栖、临平、硖石等市镇志和《浙江名镇志》、《中国城镇·浙江卷》的修纂编印成功。著名作家徐迟就以他的故乡湖州南浔镇为背景，写作了《江南小镇》一书，展示了规模壮阔的江南市镇的历史风貌和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

上述可见市镇史的研究已成为人们所重视的一个课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的研究是富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

二

市镇是城市体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必须把市镇史纳入城市史的研究范围内。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当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市就出现了。城市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实体在一定地理区域内建立起来。东西方的城市在历史上是有显著的不同。在西方，城市是乡村的对立物，城乡分离，城市挣脱了封建制的羁绊而独立出来，这是近代文明的开始。当然古希腊罗马也有城邦，这与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已有很大的差别。近代城市与王权结成联盟以反对封建王朝，是封建制解体时分离出来的，近代文明也就首先诞生于这些地中海沿岸的著名城市中。中国的城市则不同于西欧诸国。中国的城市是作为封建政权的据点，按照一定的“王制”而兴建的。城市又是居民的集结点，为了防止侵袭，必须具有防守的功能，并且是各级政权的驻所。“鰲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所谓“城者，所以自守也。”（《墨子·七患》）城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堡垒，必须具有城墙、城池等军事防御设施。《礼记·祀运》：“城郭沟池以为固。”城市又是人口聚居的地方，城的作用是划定一个区域用城池保卫起来以让人安居，所以“城，以盛民也。”（《说文》）“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淮南子·原道训》）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城市是有一定布局的。对居民生活也有所考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匠人》）这段文字不一定完全合乎历史事实，是理想中的城市规划，但是有一点则是清楚的，古人建城时已有“面朝后市”的考虑。市设于宫殿、官府之后，“廛谓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货物者也。”（《周礼·地官·廛人》郑玄注文，参见《十三经注疏》上册）。城市的发展，逮至宋代，打破了坊市制度，城市除了政治性的职能之外，商业的发展，城与市则结合得更紧密了。除了仍维持着各级政府驻地的职能外，经济性的职能依次递增。延至明代，城市的职能又有一大变化，一些工商业性质的城市大量兴起，如苏州，它既是一府的政治中心，又是太湖

流域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而后者职能显得更为突出。

市则是商业性的交易市场，自从有了私有制，有了多余产品的交换，就有了市。初期的市分布于城市中，也有一些市分散在居民集结点的井之旁，或交通要道上。《易·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正义》卷八、第七十四）《管子·小匡》记：“处商必就市井。”当时的市是朝市夕散。《战国策·齐策》：“市，朝则往，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史记·孟尝君列传》描述了朝入市而夕归的情景，“君独不见夫朝趋市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还有大市、朝市、夕市之分。《周礼·地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迟至宋时，夕市延伸至深夜始息，而晨市又接着开张，据《梦粱录》记：“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行人始稀。”（卷十三）“自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卷十六）

唐·五代在城市外圈兴起了许多草市，这些商业交易点，是适应了商品交换而发展起来，它已具备了一定量的居民，是一个具有地域性的商业居民集结点，是一个社会的实体。唐诗人杜牧说：“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自十五年来，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杀皆遍。”^[1]苏轼也记宋时宿州的草市，“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比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多，岂可一一筑外城。”^[2]

一些草市规模扩大就发展成城市、市镇，也有的发展成后来的定期的市或镇，这是明代的事了。市有定期和不定期的集市，市集的周期需视市集周围的人口、物产、商品交易量而定。有月市、旬市、有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日的市集。也有不定期的市。这种集市南方俗称市，山东称集，广东称墟。乾隆《河源县志》：

“凡粤东贸易之所，多名为墟。”（卷二，《墟市》）也有称店、步、埠、集、行等。所谓墟，带有集市时人聚，不会市时人散了，谓之虚。因“聚之时少，虚之时多，故曰虚。”云贵川一带称场。不管名称不一，但都是商业交易的场所，是具有一定的地域的居民集结点，是一个社会、经济、地理的实体。

镇比城、市出现要迟，开始它只是作为一个军事据点而兴建的，始于北魏。咸丰《南浔镇志》：“窃考镇戍置将起于后魏。”“元魏时始置镇。”（卷一）至唐设节度使镇守，这些军事要塞就称镇。所谓“镇者重也，压也。周以四方山之至大者为镇，今民居之稠，关津之所，亦以镇名。”（光绪《娄塘镇志》·《凡例》）“凡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3]至宋，镇的机制有很大变化，军事性向经济性演化，谈钥说：“本朝平定诸国，收藩镇权。……所以存在，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至于离县稍远者，则有巡检寨。”^[4]《宋史》记：“诸镇置于管下，人烟繁盛处设官管烟火禁或兼酒税事。”（《职官志》）现存的一本最早镇志常棠《澉水志》对镇制的演变很能看出轨迹。（参见拙文《绍定〈澉水志〉在市镇历史文献上的地位》（刊于美《九州学刊》5:3，1993年春季）至南宋，镇与市已并列，差别已渐消失，若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已有《镇市条》，《元丰九域志》将镇与县、乡的行政建制并列。入明，镇市已相提并论，打破原有“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禁防者谓之镇”的界限。^[5]弘治《湖州府志》卷四：“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弘治《吴江县志》卷三：“人烟凑集之处谓之市镇。”万历《嘉善县志》·《卷首》：“大曰都邑，小曰市镇，所以聚民而致货也。”当然市镇一定是人烟凑集之处，但是人烟凑集的地方也可以是大村庄或府县城邑，这点正德《姑苏志》则有明确的界定，“居民所聚谓之村，商贾所集谓之镇。”（卷十八）当然镇与市实有区分的，一是规模不同，“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6]钱大昕也说：“谓东南之俗，称乡之大曰镇，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人口不满五万者不

得称镇。”^[7]二是商业贸易额不同，“市与镇之别，前者无标准，大抵沿用旧时之习惯、名称，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8]三是历史背景不同，“市因商贾臻集而成，镇必经前代设官而立，名义各有所取。”^[9]四是起始时地理位置不同，“错见于城野之间者有市，村落所聚有镇。”^[10]五是职能上有差别，“市者事也，民各事其事；镇者，民之望也。”^[11]但仍有市镇不分的情形，凡“商贾聚集之处，今皆称为市镇。”^[12]也不以设官与否来区别，“亦有不设官而称镇，既设官而仍称村者。”^[13]镇之大者可升为县，但又不成定则。

城、市、镇在中国历史上兴建时间不一，开始时的职能也不相同，只有到了明清时才逐渐靠拢，市镇合二而一，市镇都已列入城市体系之中。

对中国城市化和市镇史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

日本学者对中国城市史(含市镇史)的研究很重视，并取得显著的成绩。首先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加藤繁发其端，他发表过《宋代都市的发展》、《唐宋时代的市》、《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均收录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书中)，他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城市发展过程，特别指出到了宋代由于坊制的废止，商店可以在都城内开设，昼夜可营业，在城外草市发展起来，开辟了城市发展上的一个新局面。他认为宋代以后的镇已“完全是指小商业都市的意思。”市“到明清时代愈来愈繁盛。”他把城市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特别与交通贸易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的观察是很有意义，排除了孤立、静止地看待市镇的发展。他的杰出贡献还在于对草市与市镇的发展关系的研究，为日本学界对市镇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从史料出发，经过严密考证的严谨的治学道路。周藤吉之教授对宋代乡村商业网点分布、市镇的不同形式也进行很好论证，他的《宋代乡村店、市、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论文。进入六、七十年